

# 青海河南蒙古盟旗制度论略

艾丽曼

**【摘要】**1723年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清朝把青海蒙古收为内藩,设立盟旗制度,河南蒙古被划分为四旗,这一制度的建立对河南蒙古族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青海河南;蒙古族;盟旗制度

**【中图分类号】**K2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09)01—0152—04

1723年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清廷依据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拟奏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开始了对青海全面的治理措施。其中针对青海蒙古的措施包括把青海蒙古收为内藩、设立盟旗制度、整顿藏传佛教寺院、实行蒙藏分治、赏罚青海蒙古诸台吉等,这些举措对青海蒙古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青海蒙古族在原来部落的基础上被分为二十九旗,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牧地在大通河上游布哈河、布隆吉尔河、柴集河两岸及河曲地区等;土尔扈特部四旗,牧地在河曲地区黄河东西两岸;绰罗斯(即准噶尔)部二旗,牧地在青海湖东南;喀尔喀部一旗,在青海湖南岸;辉特部一旗在柴集河东。<sup>[1]</sup>河南蒙古被划分为四旗,即和硕特三旗,土尔扈特部一旗,统归和硕特前首旗管辖。青海蒙古由此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 一、盟旗制度的实施

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氏族——斡孛克为社会基本组织。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汗国,制定了适应草原游牧民族的国家制度,将原有氏族大部分拆散组成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等军事和行政合一的组织,其主要特征都是以地缘为基础。15世纪以后,万户、千户由兀鲁斯、鄂托克代替,兀鲁斯、鄂托克、爱玛克、阿寅勒等既是各级行政组织,又是军事生产单位。兀鲁斯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份地”、“领地”、“人民-国家”,是指包括若干鄂托克在内的大领地。鄂托克在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中表示“场所、地域”,卫拉特蒙古语指“居住和游牧在一个地区的同一家系的阿寅勒集团”,鄂托克以地缘关系为条件,以游牧地区为前提,每一个蒙古人都必须有自己所属的鄂托克。爱玛克由游牧于同一地区的同族阿寅勒或和屯组成,阿寅勒一词指由同在一起宿营的一个、两个或三个禹尔惕(蒙古包)组成的同姓或近亲小集团,和屯指家庭集团。<sup>[2]</sup>蒙古社会组织按照阿寅勒、和屯、爱玛克、鄂托克、兀鲁斯的关系层层建立起来。

到了清朝,清廷为有效管辖蒙古,从天聪九年(1635)开始在蒙古族地区设旗,经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外藩蒙古”(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共编为18盟、201旗<sup>[3]</sup>,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朝对青海蒙古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在原有基础上改编建立札萨克旗,旗上设盟,这就形成了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成为清朝统治蒙古的基本行政管理体系。原先的部落联盟和部落组织被撤销,大体上是把原爱玛克编为佐领,原鄂托克编为旗,各旗旗长称为札萨克,旗下设有协领、佐领等大小官员,“每百户编佐领,其不满百户者为半佐领。将该管台吉俱授为札萨克,于伊等弟兄内拣选,授为协理台吉,每札萨克俱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员,每佐领俱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员,催领四名,其一旗有十佐领以上者,添设副协领一员,佐领两员,酌添参领一员”<sup>[4]</sup>,“以百五十户为一佐领,共佐领一百一十四个半”<sup>[5]</sup>。各旗之间划定

游牧地界,不得互相统属私自往来,旗上设盟,以协调不同旗之间的关系,达到“众建以分其势”的目的,防止了蒙古部族内部的统一团结,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盟指会盟制度。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固始汗)从新疆迁至青海境内后,沿用蒙古旧制,建立青海会盟、祭海制度。会盟开始由蒙古首领主持,各旗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在察罕托洛亥(今青海共和县倒淌河乡境内)会盟一次。雍正四年(1726),清廷遣官致祭,建立碑亭,开始主持会盟、祭海。乾隆十六年会盟改为二年一次,乾隆二十八年(1763)会盟改为三年一次。会盟必须在西宁办事大臣的主持监督下进行,不得私自进行。早期的会盟、祭海多在春天举行,自乾隆三十八年改为“秋天致祭”。除实行盟旗制度外,清廷还加强对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限制和管理,严格规定寺院的规模和特权,额定寺院僧侣人数,禁止喇嘛“聚众议事”,并遣散多数喇嘛,所属部落民户不再向寺院纳税服役。严加控制互市贸易,仅规定每季仲月为开市之日。对蒙古族的政治礼仪、家庭婚姻制度也进行规范和限制。在清廷严酷的统治下,蒙古族的牧地、人口减少,生活窘迫,有的甚至沿街乞讨,境况非常悲惨。

## 二、河南四旗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黄河右旋弯曲的弦部南端,史称青海黄河南部蒙古,解放前后俗称河南蒙旗。河南蒙古族先民主要为13世纪元朝军队的土默达尔吾部,明朝的土默特火落赤部,还有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及土尔扈特部。公元1257年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南宋,土默达尔吾部由甘肃南部进发,在河曲卓格浪(今甘肃省玛曲县、四川省若尔盖县和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南部)设立驿站和马场,他们中的一部分定居下来,成为当地最早的蒙古族居民。明朝蒙古族再次进入青海,以土默特火落赤为首于公元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进驻捏贡川(今青海省同仁县、泽库县一带),统辖河南地区。明末清初入驻河南县的蒙古族主要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公元1636年(明崇祯九年),原先驻牧在乌鲁木齐一带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突袭青海,其第五子伊勒都齐之子达延博硕克图济农为加强统治从海北率部南迁,自公元1652年(清顺治九年)历经十多年到达河南地区,并将原先驻牧在这一带的土默达尔吾部、土默特火落赤部并作自己的部众,开始了在河南地区的统治。

历史上的青海黄河南部主要包括今黄南藏族自治州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区。由于黄河南部蒙古始祖达延博硕克图济农及其子一世和硕亲王察罕丹津驻扎今河南县境,和硕特部势力日渐强盛后,察罕丹津也成为青海蒙古诸台吉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所以整个清代和民国时期,今河南县境一直都是黄河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清廷在青海实行盟旗制度后,河南蒙古被划分为四旗,即和硕特三旗,土尔扈特部一旗,统归和硕特前首旗管辖。

### (一)四旗世袭及编制

1. 和硕特三旗均属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之子伊勒都齐裔。和硕特前首旗(亲王旗),承袭亲王共十世。察罕丹津为第一世和硕亲王,康熙四十年(1701)封多罗贝勒,为和硕特前首旗封爵之始。雍正元年(1723)封和硕亲王,雍正三年(1725)授札萨克,下设协理台吉1员、协领1员、副协领2员、参领2员、佐领11员,佐领下设骁骑校11员(每佐领1员)、催领44员(每佐领4员);属民约1100户,民国27年(1938)约2000户,1952年中共河南工委进驻时共有2000户。第十世和硕亲王为巴勒珠尔喇布坦之女扎西才让,民国2年(1913)晋封和硕亲王,“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幸离世。

2. 和硕特南左翼中旗(拉加旗),康熙五十年(1711)封喇察布辅国公,为和硕特南左翼中旗封爵之始。雍正三年(1725)授札萨克,下设协理台吉1员、协领1员、副协领1员、参领1员、佐领4员,佐领下设骁骑校4员、催领16员。属民约400户,民国24年(1935)划归同德县,民国27年(1938)约160余户。

3. 和硕特南右翼中旗(达参旗),康熙五十九年(1720)封阿喇坦扎木索辅国公,为和硕特南右翼中旗封爵之始。雍正三年(1725)授札萨克,下设协理台吉1员、协领1员、副协领1员、参领1员、佐领5员,佐领下设骁骑校5员、催领20员。属民约500户,民国27年(1938)约400户,1952年中共河南工委进驻时共有313户。

4. 土尔扈特南前旗(卡松旗)为元太师翁罕裔。雍正元年(1723)授察罕喇布坦札萨克一等台吉,

为土尔扈特南前旗封爵之始。下设协领 1 员、副协领 1 员、参领 1 员、佐领 1 员,佐领下设骁骑校 1 员、催领 4 员。属民约 100 户,民国 27 年 (1938)约 300 户,1952 年中共河南工委进驻时共有 168 户。<sup>[6]</sup>

河南四旗历代亲王、郡王、札萨克世袭表<sup>[7]</sup>

世系 \ 旗别	前首旗 (亲王旗)	南右中旗 (达参旗)	南左中旗 (拉加旗)	土尔扈特南前旗 (卡松旗)
一世	察罕丹津	阿喇坦扎木索	喇察布	察罕喇布坦
二世	旺舒克	达什那木扎勒	察罕喇布坦	达尔扎
三世	旺丹多尔济帕兰木	礼塔尔	多尔济色布腾	色布腾多尔济
四世	纳罕达尔济	隆 贡	旺舒克喇布坦	衮楚克
五世	达什忠鼎	旺扎勒多尔济车布腾	纳罕达尔济	玛齐克车楞
六世	达锡旺扎勒	达什端多布	罗卜藏丹津	索南木喇布坦
七世	春 津	衮布旺扎勒	沙拉布提理	车楞端多布
八世	巴勒珠尔喇布坦	巴勒珠尔喇布坦	衮布多尔济	噶勒藏旺扎勒
九世	更尔环觉	车楞塔尔	贡楚车布腾	老 登
十世	扎西才让 (女)		索南木多尔济	公保扎西
十一世			更 登	

(二)四旗牧地范围

罗卜藏丹津反清之前,察罕丹津辖地分为本部蒙古族驻牧地和附属藏族驻牧地两部分。附属藏族驻牧地包括今青海省循化、尖扎、同仁、泽库四县,甘肃省夏河、碌曲、玛曲、迭部四县以及青海省玉树、果洛部分地区,四川省阿坝、甘孜部分地区等。划旗定界后,清廷推行“扶番抑蒙”政策,从察罕丹津辖地划去德格、甘孜、白玉、石渠、俄瓦、多维、上下热贡、甘南四县部分地区,卓盖诸藏驻地等,河南四旗的辖地缩小了大半。清朝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中对划旗定界时河南四旗的辖地记载如下:

- 1. 和硕特前首旗:南当黄河之曲,有小哈柳图河流入黄河,东至拉卜楞希拉德布沙 (今甘肃夏河县城东,接南右翼中旗界),南至和托果尔希里克 (接土尔扈特南前旗界),西至巴尔鄂博巴颜乌拉 (接南左翼中旗界),北至额尔德尼布、乌鲁勒卜达巴 (接贵德厅界)。
- 2. 和硕特南左翼中旗:西滨黄河,有恰克图河东南流入,东至巴哈图尔根 (接前首旗界),南至阿尔坦果尔 (接阿里克界),西至伊克图尔根 (今玛沁县达贡卡一带,接阿里克界),北至巴哈图尔根 (接察汉诺门罕游牧界)。
- 3. 和硕特南右翼中旗:位鲁察布拉山 (今李恰如山)之西,东至库克乌松 (接循化厅界),南至齐克特尼诺尔 (接土尔扈特南前旗界),西至僧格图木齐 (接南左翼中旗界),北至库克乌松西山 (接贵德厅界)。
- 4. 土尔扈特南前旗:有伊克哈柳图河流入黄河,东至古鲁半博尔齐沙拉图 (接南右翼中旗界),南至黄河 (接阿里克界),西至宗科尔 (接南左翼中旗界),北至恰克图 (接前首旗界)。<sup>[8]</sup>

宣统二年 (1910)据西宁办事大臣奏报的《番属要政统计表》,河南四旗驻牧地比划旗定界时又大大缩小。到了民国初年,河南四旗驻牧地进一步缩小,据《开发西北》1935 年 4 卷 1 期载,各旗牧地范围情况如下:

- 1. 和硕特前首旗:在贵德县黄河南,西倾山东部。东与甘肃为界,南界四川,西至黄河什则寺 (今什藏寺),北接土尔扈特南前旗界。
- 2. 和硕特南左翼中旗:黄河南岸拉加寺附近,东至贵德县界,西濒黄河,至拉加寺,南至察罕津与土尔扈特南前旗为界,北至伊克哈柳图河 (今泽曲河)与南右翼中旗为界,地当河南蒙古四旗贸易之中心,又为果洛克五族购粮之孔道。
- 3. 和硕特南右翼中旗:在黄河南岸,伊克哈柳图河之北,东至大夏河,西至黄河,南至和硕特南左翼中旗界,北至贵德县界,土地肥沃,可垦之地极多。



4. 土尔扈特南前旗:在黄河南西倾山北部,东至甘肃省,南至和硕特前首旗界,西至黄河察罕津,北至和硕特南左翼中旗界,地居黄河之西,土壤肥沃,极富农垦。<sup>[9]</sup>

民国 24年(1935)5月同德县成立,青海省又将和硕特南左翼中旗划归同德县,河南蒙古只剩三旗,由前首旗十世和硕女亲王扎西才让统辖至解放前夕,今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就建立于三旗的辖域基础上。

### 三、盟旗制度的影响

盟旗制度的设立对河南蒙古造成巨大影响,河南蒙古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落。

#### (一)蒙古势力的削弱

明崇祯九年(1636)和硕特部在其首领固始汗的率领下由新疆迁至青海后,继而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固始汗国,蒙古统治威震四方。河南蒙古一世亲王察罕丹津雄才大略,深得清廷赏识,在诸蒙古台吉中地位显赫,因此河南成为黄河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对青海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盟旗制度开始实施后,蒙古各部被划分为互不统属的旗,每个旗由札萨克、亲王、郡王等来统领,这些封号又由朝廷授予,盟长没有自行处理札萨克旗重大事务的权力,旗长也无军政实权。各旗一切大小事件均需呈报西宁办事大臣办理。各旗只能在指定的牧地放牧,不得越界放牧或迁徙,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使蒙古各部居于狭小的地域内,限制其势力的扩大,蒙古各部难以形成政治整体,同时也把蒙古各旗隔离起来,减少了彼此间的往来沟通。察罕丹津在蒙古贵族中虽然依旧位高权重,但已是今非昔比,蒙古势力日渐衰落。

#### (二)牧地缩小、人口减少

划旗定界之前,河南蒙古一世亲王察罕丹津的领地除了青海,还包括甘肃、四川的部分地区,可见其势力范围之大。划旗定界后,清廷割去了察罕丹津大部分的领地,到民国 24年(1935),河南蒙古所剩三旗的范围大体是:北起那木翁的滴果洛,向东沿加西罗兰木、华日喀岗山梁,经索伊喀却乎、喀才汤柔到智合纳赫接克其赫山,沿山脊向南,经曲纳赫到周可河入洮口,沿周可河折向西南至今甘肃省碌曲县尔海(蒙语称齐克特诺尔),经喀诺什哈喀哇,顺山向南直至黄河,沿河向西至西科河入黄口,沿西科河谷至谷脑,接德库乎、嘎科河沟脑南北分水岭,沿嘎科河西山梁向北至黄河沿什藏寺,自寺向北至温柏,接俄玛勒喀恰。东西长近 200公里,南北宽约 100公里。<sup>[10]</sup>牧地减少,势力削弱,加上清廷“扶番抑蒙”政策、藏族争夺蒙古牧地、蒙古内部的各种纷争等原因,致使整个青海蒙族社会出现严重的衰退,人口大量减少。雍正三年(1725)青海蒙古族约为一万七千余户,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一万一千余户,减少三分之一。<sup>[11]</sup>雍正三年(1725)河南蒙古四旗约计 8400人,至宣统元年(1909)人口减少到 1556人,184年间河南四旗人口减少 81.5%。<sup>[12]</sup>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在道光二年(1822)的奏议中对青海蒙古的惨境有过记载:“而今之蒙古孱弱已极,不但不能自强且均逃散,或依附官兵营卡,或避至附近州县。游牧则无牲畜,谋食又无生业,多在西宁及甘、凉、肃等处乞食,穷苦实在可悯,一时竟难归束。”<sup>[13]</sup>蒙古部落大量贫穷人口等待朝廷救济,河南蒙古进入衰退的历史阶段。

#### (三)加速蒙古文化的消融

河南蒙古族先民在进入河南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巩固自身实力,积极与藏族上层人物接触,大力倡导学习藏族文化,虔诚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重视选送本民族青少年入寺为僧学习藏语藏文。蒙藏上层人士乃至民间百姓通婚频繁,历代河南亲王和拉卜愣寺嘉木样活佛保持了几世的家族联姻。从地理位置上看,河南蒙古族处于甘青藏族的包围中,内部又同藏族阿柔部落长期杂居,这些因素导致河南蒙古极易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实行“盟旗制度”后,河南各旗只能在本旗范围内活动,河南四旗西部虽与土尔扈特南中旗、南后旗等相连,但在乾隆以后在扶藏抑蒙互不统属的政策下被藏族部落隔断,难以形成整体,河南蒙古逐渐失去与其他地区蒙古族的联系,完全浸润在藏文化的包围中。据史料记载,到公元 1806年左右(清嘉庆初年),当地蒙古族百姓的服装已与藏服基本相同,大多数在样式上与藏族已无多大区别。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在其奏议中写道:“蒙古近来竟有穿戴番子衣帽毫无区别者。”<sup>[14]</sup>划旗定界后,河南蒙古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中,逐渐远离自己的文化而融入了藏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下转第 111页)

总之,甲骨卜辞中“土方侵我田十人”、“<sup>𠂔</sup>方出侵我示<sup>𠂔</sup>田七十人五”就是敌方侵犯我十人、七十五人的田。从这两条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出殷代的土地往往是由氏族里的劳动者来垦种的,他们对土地有者使用权。“侵我田”卜辞的释读必将为研究商代的农业提供宝贵的材料。

#### 【参考文献】

- [1][12]唐兰.殷墟文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
- [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318.
- [3]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M].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64.
- [4]胡厚宣.殷代<sup>𠂔</sup>方考[A].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7.
- [5][14]郭沫若.卜辞通纂[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439.
- [6]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322.
- [7]张光直.商文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149.
- [8]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盘龙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2.
- [9]董作宾.武丁日谱[A].殷历谱[M].北京:中国书店,1981.
- [10]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第51片考释)[M].北京:辅仁大学影印本,1939.
- [11]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行动[A].古文字研究(第16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9.116.
- [13]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338.
- [1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310—311.
- [16]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60,(1).
- [17]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A].张光直,李光谟.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18]李济.殷墟有刃石器图说[A].张光直,李光谟.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19]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57,(1):99.
-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J].考古,1961,(2):67.
- [21]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5.
- [22]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2.
- [23]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8.
- [24][27]张政烺.卜辞“衰田”及其相关诸问题[A].张政烺文史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4.427、436.
- [25]恩格斯.马克思[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5.
- [26]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辩与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357.
- [28]杨升南.殷契“田”字说[A].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C].成都:巴蜀书社,1990.54.

【作者简介】王进锋,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先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

---

(上接第155页)

#### 【参考文献】

- [1][11]卞一之主编.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82、195-196.
- [2]马大正,成崇荣.卫拉特蒙古史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269-276.
- [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22.
- [4]清世宗实录:卷20[M].
- [5]西宁府新志:卷20·武备·青海[M].
- [6][7]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河南县志(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631-639、637.
- [8][9]阿玲,张照云.青海蒙古史料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45—66、124—128.
- [10]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河南县志(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63.
- [12]王希隆.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4.
- [13][14]清·那彦成.那彦成青海奏议[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159、70.

【作者简介】艾丽曼,女,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族群文化变迁。